



MEIGUOREN ZAI GUANGZHOU



美国人在广州



1784—1912

梁碧莹 著

M E I G U O R E N Z A I G U A N G Z H O U

美国人在广州



1784—1912

梁碧莹 著

SPM 南方出版传媒 广东人民出版社

·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美国人在广州：1784—1912 / 梁碧莹著. —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4. 10

ISBN 978-7-218-09628-5

I. ①美… II. ①梁… III. ①中美关系 - 文化交流 - 文化史 - 1784—
1912 IV. ①K203 ②K712. 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18142 号

MEIGUOREN ZAI GUANGZHOU

美国人在广州 (1784—1912)

梁碧莹 著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出版人：曾 莹

责任编辑：王俊辉

装帧设计：书窗设计室

责任技编：周 杰 黎碧霞

出版发行：广东人民出版社

地 址：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10 号（邮政编码：510102）

电 话：(020) 83798714（总编室）

传 真：(020) 83780199

网 址：<http://www.gdpph.com>

印 刷：广东信源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书 号：ISBN 978-7-218-09628-5

开 本：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38 字 数：710 千

版 次：2014 年 10 月第 1 版 201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120.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 (020-83795749) 联系调换。

售书热线：(020) 83795240 邮购：(020) 89667808

中生代商贾云集于通商口岸，成了岭南大都会。然而，近代中国事物的精英精英荟萃于“海上丝绸之路”，似乎并不奇怪，“世界”如何却一派神秘色彩，莫非是由于

序

“海上丝绸之路”本身，本就入世而富于神秘，古人的海上航行技术承继了前人高超的航海经验，到了宋元时期，有了《指南针》、《水经注》、《海国图志》等许多航海家著述，到了清末民初，更是蔚然成风，举世闻名。当然，这些人物各有侧重，但其共同点在于，他们都是对“海上丝绸之路”感兴趣的学者，有下面两个学者研究此书时的一段话：

“……
李子山先生著于1948年”

梁碧莹教授的新著《美国人在广州（1784—1912）》即将出版，约我写几句话以当喤引，并志多年同事之谊。受命之际，我想与其泛泛而谈，还不如从此时、此地、此人说起，也许更能避虚就实，以免序言变成套语。

2014年是美国商船“中国皇后号”首航广州二百三十周年，此书应时面世，其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自不待言。中山大学的现址康乐园，是美国教会创办的岭南学堂的故地。梁书作为康乐园人文学科的新产品，具有雅俗共赏的“南学”特色。梁碧莹教授既是土生土长的广州人，又是康乐园里一位勤敏静默的杰出学人，三十年如一日，持之以恒研究早期中美关系，根深叶茂，著述甚丰。这一回，应算是老树开新花了。上举三端，堪称天造地设，得其人矣。

历史的根很长，穿越百代才延续到今天。早在明末清初，广州流行过一个倒果为因的风水传说：“花塔、光塔为一城之标，形胜家谓会城如大舶，二塔其檣，五层楼其舵楼云。”（《广东新语》卷一九）形象化的“大舶”取譬，集中表现出广州口岸外向型的经济特征，及其从市舶时代向洋舶时代转变的历史趋势。所谓“洋气”，无非就是欧风美雨，首当其冲者正是广州。因此，将广州口岸史与中美关系史结合起来，才有可能作出历史与逻辑统一的考察，从中探求后来居上的“美雨”何以“虽非驯服，尚少刁顽”（两广总督李鸿宾语）的缘由。除了题旨富有新意外，这部新著还有一个结构上的特色，就是以人物为主体，但又不是列传的组合。全书按历史序列和社会类型，记述了美国人在广州的形形色色：商人、传教士、医生、游客、教师、使节、税务司，乃

II 美国人在广州（1784—1912）

至格兰特总统的中国之行，等等。所有入选的人物，均被置于历史网络之中，有血有肉，有声有影，虽同属“花旗”，但没有被脸谱化，当然也就不会有惟褒或惟贬的绝对化了。

历史学的功能是知人论世。历史研究要以人为本，从人出发，向人回归。梁碧莹教授的《美国人在广州（1784—1912）》，以翔实的资料和清新的文笔，构建了一个各具面目的人物画廊，包含着丰富多彩的历史情节，可读、耐看、有益。我祝贺她在退休之年退而不休，竟能作出如此平实而不平凡的奉献。

蔡鴻生

2014年6月于中山大学

序
第一
章
第二
章
第三
章
结语

士对美国的第一次访问——周文王

商人与政治家——周文王

目 录

序	021	士对美国的第一次访问——周文王 商人与政治家——周文王 周文王与周公 《诗经》与《周易》 周文王与周公 周文王与周公
		蔡鸿生 I

导论

第一章 纽约至广州破冰之旅的见证者

——美国商人兼驻广州领事山茂召	17
一、探索中国之行的人们	18
二、从少校到大班的山茂召	23
三、“中国皇后号”破冰之旅	27
四、山茂召在广州	30
五、美中通航的美国效应	38
六、山茂召重返广州	44
七、见证中美友好交往的日記	50

第二章 一幅呈现广州十三行外贸的画卷

——美国商人亨特及其著作	56
一、鹰对龙的第一印象	57
二、英华书院的美国学生	62
三、亨特笔下的世界首富伍秉乾	65

四、呈现广州十三行的辉煌	72
五、介绍广州风土人情	79
六、客观与偏见	84
第三章 第一位来华的美国传教士	
——裨治文	87
一、海外传教的召唤	88
二、新教广州传教站	92
三、在华实用知识传播会	99
四、创办《中国丛报》	103
五、介绍美利坚合众国	110
六、观看虎门销烟	120
第四章 传教士、外交家、汉学家	
——卫三畏	128
一、传教士印刷工	129
二、让美国人了解中国	136
三、卫三畏笔下的广州	142
四、二十年的外交官生涯	148
五、晚年致力于中美文化交流	161
第五章 用手术刀揭开医学传教的帷幕	
——广州眼科医局的创始人伯驾	167
一、医学传教之旅	168
二、新豆栏医局	172
三、中华医学传教会	183
四、伯驾修约失败	187
五、建议美国占领台湾	190
六、褒与贬，众说纷纭	194

第六章 中国第一所西式学堂的校长

——鲍留云与马礼逊学堂	201
一、马礼逊与英华书院	202
二、马礼逊教育会	206
三、马礼逊学堂校长鲍留云	211
四、澳门马礼逊学堂	218
五、迁往香港后的马礼逊学堂	221
六、开风气的西式教育	225
七、新型的学堂 杰出的学生	228

第七章 中美不平等关系的形成

——顾盛与中美《望厦条约》签订	251
一、广州美商与鸦片走私	252
二、美国对鸦片战争的反应	255
三、顾盛使团的派遣	259
四、顾盛与程裔采“照会战”	264
五、望厦村谈判始末	267
六、《望厦条约》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276

第八章 为医学贡献毕生的美国医生

——嘉约翰	283
一、嘉约翰与博济医院	284
二、创办博济医学堂	292
三、翻译西医书籍	300
四、中国第一个精神病院	307
五、各界人士眼中的嘉约翰	313

第九章 美国总统的中国之行

——格兰特访问中国	318
一、“常胜将军”	319

二、总统与中国留美幼童	323
三、香港、广州之旅	329
四、上海之行	332
五、与李鸿章的交情	337
六、将军陵园故事多	345
第十章 广东民众曾经对美国说不	
——1905年广东反美拒约风潮与塔夫脱代表团访华	350
一、抵制运动导火线——美国排华	351
二、广东反美拒约风潮	355
三、塔夫脱代表团在粤港两地	367
四、岑春煊与美领事交涉	379
五、美国政府的回应	387
六、中国的觉醒	395
第十一章 美国人照相机下的广州风情	
——美国摄影师的广州照片	399
一、三位来华旅游的美国摄影师	400
二、清末的广州城	405
三、广州的商业	410
四、广州水上人家	412
五、广州沙面风貌	415
六、广州的寺庙、宗祠和贡院	418
第十二章 广州岭南学堂的美籍校长	
——哈巴安德、香便文、尹士嘉、晏文士	424
一、哈巴安德	425
二、广州格致书院的创办	429
三、第二任校长香便文	435
四、尹士嘉主持下的岭南学堂	439

五、晏文士与“岭南”	446
六、美籍校长们的著述	455
 第十三章 粤海关美籍税务司	
——吉罗福、吴得禄	466
一、外籍税务司制度的形成	467
二、吉罗福与粤海新关的建立	474
三、粤海关与广州同文馆	482
四、粤海关税务司吴得禄	486
五、近代粤海关历史陈迹寻踪	498
 第十四章 从哈佛到中国海关	
——美籍税务司杜德维	507
一、美籍税务司杜德维	508
二、杜德维与世界博览会	514
三、1894年广东省息借商款	520
四、杜德维与哈佛大学汉学	528
五、粤海关报告中的广州	536
 第十五章 海关洋员兼历史学家	
——马士	546
一、进入中国海关	547
二、主持粤海关和任职上海造册处	551
三、马士的“第二职业”	557
四、马士与费正清	562
五、马士论广州行商制度	567
 参考书目	
后记	575
	590

导论

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世界上，广州都享有特殊的历史地位，它不仅是具有两千多年历史的文化名城，也是我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祥地，更是岭南文化的中心地。广州地处南粤，濒临大海，坐拥珠江，毗邻港澳，这样特殊的地理位置，使这个沿海城市，在对外交往的舞台上可以自由挥袖，如鱼得水。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广州以其海纳百川的胸怀，充当了中国对外开放的窗口，成为连接海内外的枢纽与桥梁。开放带来繁荣，广州的对外交往史，带来广州历史上经久不衰的繁荣，连来华外国人也不得不承认，广州“因对外贸易而繁荣昌盛”。

中国南大门——广州，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自古以来与外界有着频繁的接触，其对外贸易史源远流长。在秦汉时期，广州已是我国的主要港口和海上丝绸之路的起航点。唐宋时期，它不仅是当时中国对外贸易的第一大港，也是闻名海外的世界著名港口之一。贾耽在《皇华四达记》中记载，唐代“海上丝绸之路”航线有两条：一条是从广州起航到日本；另一条是从广州起航经南海、印度洋沿岸到达红海地区。后者称为“广州通海夷道”，当时从广州出海直到波斯湾、东非和欧洲，全长 14000 公里，是 16 世纪前世界上最长的远洋航线。广州港口在“海上丝绸之路”占据首要地位，享有“雄藩夷之宝货，冠吴越之繁华”的盛誉。

具有漫长海岸线的中华帝国，海洋犹如一个天然的防御屏障，海禁是明朝第一位皇帝朱元璋所制定的“祖训”。然而，到了清朝康熙盛世时，康熙皇帝审时度势，实行开海通商政策。1685年，清政府指定广州、漳州、宁波和云台山为对外贸易口岸，创立粤海、闽海、浙海和江海四大海关，这是中国历史上正式建立海关的开始。到了1757年，清政府撤销了漳州、宁波和云台山三处通商口岸，指定广州为唯一的对外贸易口岸，粤海关也成为我国唯一管理海外贸易的机构。这样，广州就成为对外贸易和交流的特别“窗口”，这种情况一直到鸦片战争为止。从1757年到1842年，在这长达85年的时间里，全国的对外贸易全部集中在广州一地进行，举泱泱大国的对外贸易于一地，商机处处，中外来客络绎于途。广州正因为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特定的历史条件，一度成为中国最繁荣的城市，在世界范围内也是声名赫赫。广州的贸易辉煌具体体现在：广州的进出口商品种类急剧增加；外国在广州设立的商馆不断增多；进入广州的外国商船与日俱增；粤海关的关税收入显著增长。

广州被指定为一口通商口岸后，葡萄牙和西班牙垄断东亚的时代早已成为往事，荷兰、英国、瑞典、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商船相继出现在广州黄埔古港，黄埔古港是各国商船的碇泊港，这是一片风景秀丽，景色怡人的水域。根据清政府的“规矩”：“洋船停泊黄埔，外商居住广州，水手不得登岸”。黄埔岛上设有为洋人服务的设施，包括负责报关征税的税馆；办理洋船贸易等各种手续的夷务所；为外商提供后勤服务的买办馆；清政府派驻防卫的军营。黄埔岛的居民有几千人，大多数充当与洋船有关的买办、装卸工、修船匠等工作。洋船在黄埔港靠岸后，船长和负责商贸的“大班”，就会乘小艇前往广州的十三行商馆区，开始了对华的商业活动。在这跨越18世纪、19世纪的百年中，广州完成了从古代贸易港向近代通商口岸的转变，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环球贸易的唯一大港。从广州起航到世界各国贸易的商船大增，各国客商前来广州者，“舟舶继路，商使交属”。据统计，乾隆十四年至道光十八年（1749—1838年），到广州贸易的外国远洋商船达5266艘，平均每年近60艘。^①

随着大批远方商人的到来，外国在广州设立的商馆不断增加。在广州城西

^① [清] 梁廷相总纂，袁钟仁校注：《粤海关志》卷二十四，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84—488页。

的珠江边形成了一排租给外商居停贸易的楼房，外商称之为“商馆”，中国人称之为“夷馆”。几个商人可合租一馆，同一国籍的外商也可租用一个以上的商馆，如英国与广州贸易的资金和实力雄厚，便拥有两个馆。数不清的中外贸易在这里进行着并取得成功。远道而来的外国商人虽则受到清政府诸多清规戒律的限制，但对在广州的贸易仍然表示满意。美国商人亨特曾说，在广州做生意“是最愉快不过的，各项手续都十分容易和方便”。1830年英国下议院关于对华贸易审查委员会会议中，几乎所有出席的证人都认为，在广州做生意比在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都更加方便和容易。仔细分析，外商对在广州贸易感到愉快、容易和方便，是基于两方面的现实，即在商馆区生活的安全和中国行商的诚信。外商在广州生活比在伦敦还要安全，因为广州当局对外商加以保护，有专人维持治安，即使在外商与当地商人或与民众发生纠纷时，外商往往得到迁就。行商的诚实和商业道德均有口皆碑，并扬名于伦敦的街谈巷议中以及孟买的生意场上，贸易中的书面契约甚至有时都不需要，而只需口说为凭。

粤海关开关第二年（1686年），在外国船即要到达广州口岸时，广东官府和粤海关公开招募较有实力的商家，指定他们与洋船上的外商做生意，并代海关征缴关税。这样，一个全新的商人团体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它就是以后远近驰名的广州十三行商人。“他们和大清国共同经历了风风雨雨，当清帝国只向外部世界推开一丝门缝的时候，他们成为了掌管这道缝隙的人。”^①“十三行”并不反映商家的实际数字。历史上，洋行数目因贸易形势的起伏而变动不定，最多时有26家，最少时只有4家。这是一个半官半商的外贸垄断组织，行商是官方承认的外贸代理商，在贸易上，他们控制着广州口岸全部外贸，内地货物必须通过他们买进运出，行商从中抽一笔手续费作为佣金，然后用他们的名义报关。在管理上，行商同时有责任管理广州商馆的外国人和停泊在黄埔港的外国船，因此，他们又是保商，是外商在广州开展商务的监护人。广州十三行商人是在朝廷“一口通商”的特殊国策中孕育、发展的商人群体，在与外商交往中，他们以精明勤劳而实干高效的经营之道，赢得外商的好评，他们的行号经历着兴衰的变化。事实上，他们是在“官”和“洋”夹缝中艰难求生存的一个群体，兴盛时，他们成为这个时代最富有的人，他们的生意遍布世界，外国

^① 李国荣主编，覃波、李炳编著：《清朝洋商秘档》，九州出版社2009年版，第89页。

4 美国人在广州（1784—1912）

的媒体和著作亦绘形绘色地对帝国商人大赞一番。然而，他们处在中西交往的风口浪尖，最终避免不了走上由盛极而衰的命运。鸦片战争硝烟，宣告帝国商行的结束。

广州十三行对外贸易这段历史，是这座城市永不褪色的历史丰碑，正是十三行的对外贸易，推动了广州的繁荣发展，也使广州这个城市的名片海外传扬。每年春夏季节各国商船乘着季风来到广州，驶入珠江航道上的黄埔港，在十三行交易后，带着享誉世界的中国“三宝”：茶叶、丝绸、瓷器，于冬天借助东北风回归。繁荣的中外贸易，促进粤海关的关税收入显著增长。在年复一年的贸易风中，积聚了巨量财富的广州，被誉为“天子南库”，而 Canton 的名字不胫而走，为世人所向往，成为各国商人争相前往发财的理想之地。广州进出口贸易商品量值也不断增加，乾隆二十三年至道光十七年（1758—1837 年），向粤海关纳税后贸易商品总值达白银 422716895 两。^① 屈大均在《广州竹枝词》中的诗作，画龙点睛地道出十三行丝织业的兴盛：“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二洋。五丝八丝广缎好，银钱堆满十三行。”

那么，当时的外国人是怎样看广州？在外国人眼里，广州几乎成为中国的同义语。在外国人的著作里，经常出现 Canton 一词，这就是广州，直到现在，有些外国著作仍然用 Canton 代替 Guangzhou。年轻的亨特来到广州时，就很不习惯把 Canton 的后一个音节 ton 重读。美国人卫三畏于 1847 年写了一部《中国总论》，1883 年又一次进行修订，该书被称为“有关中国的一个信息宝库”，在那个时代无人可代替。书中介绍，“广东省”意即宽广的东方，“省会广州府”，意即宽广的城。广州人称广州为“广东省城”或简称“省城”。卫三畏引用古代传说，介绍广州的别名是羊城，又称仙城。而“英语 Canton 一词，是‘广东’的讹称，按葡萄牙语方式拼写”。卫三畏认为，广东省“很久以来就是十八省中允许外国人进入的唯一省份，几乎成为中国的同义语”。“广州是华南最有影响的城市，其富裕和奢华的声誉，远播到中部和北部的省份，甚至海外。”^② 美国传教士裨治文认为，广州是中华帝国与西方各国之间全部贸

^① [清] 梁廷枏总纂：《粤海关志》卷十，第 198—206 页。

^② [美] 卫三畏著：《中国总论》上册，陈俱译，陈绎校，世纪出版集团、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11—119 页。

易的中心，这座城市成为数额很大的国内外贸易的舞台。^① 卫三畏更具体指出，广州人是“中国人当中最有活力的一群人”。

欧洲人把广州看成是“中国的门户”，是一个整体。英国人马戛尔尼在1793年12月19日到达广州，他为能跑遍这座城市而感到自豪。他在日记中写道，东印度公司的先生们被圈在广州城外的代理行里不能进城，因此，能跑遍这个大城市是很自豪的。欧洲人虽然对广州知之不多，但一提起它就像谈起一座熟悉的城市一样。“我很好奇，想看看这座城市。我从它的一端穿到另一端。大家说它有一百万居民。看到到处是人，也许这并不言过其实。”先不要说广州当时确实有多少人口，但当时广州人口稠密倒是真的。马戛尔尼在日记中记载广州人“都很忙碌”，他们忙于“制作缎子鞋”、“编织草帽”，“街上很窄，都是石板路面，在街上既看不到二轮马车，除了我的仆人骑的之外，也看不到马”。广州只是个大市场，而从军事观点来看，“城墙完好”，但“没有一门炮”。^② 马戛尔尼使团副特使斯当东来到广州，为眼前的景象而惊讶，他简直不知道广州是属于哪个国家。他所著《英使谒见乾隆纪实》一书中这样描述广州：“作为一个海港和边境重镇的广州，虽然有很多华洋杂处的特色。欧洲各国在城外江边建立了一排他们的洋行。华丽的西式建筑上悬挂着各国国旗，同对面中国建筑相映，增添了许多特殊风趣。货船到港的时候，这一带外国人熙熙攘攘，各穿着不同服装，操着不同语言，表面上使人看不出这块地方究竟是属于哪个国家的。”^③

在中外贸易繁荣之地，广州人又如何看待外国人呢？当时广州人对外国人一律称为“番鬼”。当然这是贬称，因为16世纪初期，早期葡萄牙殖民者踏上中国南方这片土地，他们在广州沿海的掠夺和暴行，破坏了这里的和平与宁静，引起人民的愤慨，怒称他们为“番鬼”。这一称呼就这样沿用下来，它反映了广州人民对西方殖民主义侵略的反感。但具体到各国人又有其独特的叫法：称英国人为“红毛鬼”，称帕西人为“白头鬼”，称摩尔人为“摩锣鬼”，称荷兰人为“荷兰”，称法国人为“法兰西”，称美国人为“花旗鬼”，称瑞典

^①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2, p. 289.

^② [法]佩雷菲特著：《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王国卿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1993年版，第514页。

^③ [英]斯当东著：《英使谒见乾隆纪实》，叶笃义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495页。

人为“瑞”，称丹麦人为“黄旗鬼”，称葡萄牙人为“西洋鬼”。^① 不过，直至现在，也有不少广州人仍然称外国人为“番鬼”，如“鬼佬”、“鬼仔”、“鬼妹”等，但已经没有恶意，只是一种习惯用语而已。

与外国商人打交道最多的是广州商人。具有广州人品性的广州商人能够在诡谲多变的商场中屡创佳绩，成为商海里风口浪尖的弄潮儿，靠的就是灵活变通的商业精神。广州人的品性与珠江三角洲特定的环境息息相关。屈大均说：“岭南濒海之郡，土薄地卑，阳燠之气常泄，阴湿之气常蒸。”这里指的是气候变化无常，阴晴不定。在这里生活的人们，必须学会适应变幻莫测的环境，久而久之，广州人就养成了灵活变通、处变不惊、从容淡定的品性，广东商人尤为突出。人们容易看到的是“银钱堆满十三行”的一面，殊不知在广东商人风光的背后，却危机四伏，商人的“生意经”是一本难解读的书。从事商贸者在多变的商场上，机会与风险并存，态势变化莫测。史家说，广东十三行商人是一支在“狭缝中求生”的群体。我们必须看到，正是这种艰难而多变的环境，使广东商人养成了从容淡定、正视现实、处变不惊的自信心。来华的外国人对广东商人的性格和职业道德有诸多正面的评论。

广东作为中华文明与外来文明交汇的前沿地带，在中外文化交流中始终担负起双重的作用，中华文明从这里走向海外，流传世界；海外新风从这里吹进内地，磨砺传统。广州人不仅善于与外国人做生意，也善于接纳外来的先进文化。就地理而言，粤北有五岭为天然屏障，远离封建朝廷和传统文化；而面向大海，外通大洋的特殊地域，也使广州在面对异域文化时，体现了开放、兼容的特性。由于长期以来形成的开放性、兼容性和多元性，又使世世代代的广州人养成自然的开放心态，以其开阔的视野，不拘一格，博采众长，积极吸取海内外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这种得天独厚的优势使得我国许多内陆地区难于望其项背。

在广州，西洋的东西在这里大行其道，处处可见东西方文明交汇的成果。西方传来的建筑风格、生活方式、语言交流都融合了当地的元素，成为人们所能接纳的多元文化。在建筑制造方面，如广州十三行房屋建筑中的“骑楼”，

^① [美]威廉·C.亨特著：《广州“番鬼”录——缔约前“番鬼”在广州的情形 1825—1844》，冯树铁译，骆幼玲、章文钦校，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6—47页。

引进西方和地中海国家廊柱式建筑格局。两三层的楼房，楼上住人，楼下开店，那段跨出街面的部分，既扩大了楼上居室的面积，又为楼下出入店铺的行人遮阳挡雨。当时，西方传入广州的先进产品很容易为当地人接受。举一例，广州街道狭窄，人口稠密，时有火灾发生。历史上的十三行也屡遭大火，1773年的大火，焚毁商馆、行号房屋 430 座。1822 年，一家饼店失火波及十三行，大火连续烧了两天，商馆行号变成焦土。1836 年，当大火再度光顾时，与火场近在咫尺的怡和行竟得以幸免，在当时被视为奇迹，原因是商人伍浩官吸取以前火灾的教训，引进了五部当时英国最先进的灭火机，才躲避此劫。^①

外国人的生活方式，饮食习惯和爱好，不仅被广州人所了解，而且逐渐被认同。在外国人聚居的十三行和沙面，西方餐饮文化得到了集中的展示。随着西方人的大量涌入，“番菜馆”也便应运而生，第一家中国人自己经营的西餐馆，首先诞生在广州，那就是现今北京路的西餐厅——“太平馆”。创办人是曾在沙面旗昌洋行当过厨杂的徐老高。徐老高离开洋行后，沿途摆卖自煎牛扒，竟然很受欢迎，因而萌发了开西餐厅的想法。自此以后，广州的西餐厅逐渐多起来，西餐文化被广州人所认同。久而久之，洋人的文化生活情趣为广州人所模仿，吃西餐成了广州人家生活时尚。

在商贸活动中心的十三行，动辄数万的大宗生意每天都在成交，语言就成为最大的问题。聪明的商人们把英语赋予了广东元素，这样，“广东英语”也就应运而生。当时广州的中国人，没有一个是能够读或写英文的。外国人学习中文并非易事，而且受到清政府的限制。于是，中国人便创造了一种独特的语言——“广东英语”。这是一种“没有句法，也没有逻辑联系的语言”，只将其化为最简单的成分，在广州的中国人与外国人之间用作进行商业交易和往来的独特语言。这种语言不讲文法、句法，混杂着汉语、葡萄牙语、英语、印度语的词汇，成就了一笔又一笔巨额生意，并流行了一百多年之久，成了中外贸易一段佳话。

^① 李国荣主编，覃波、李炳编著：《清朝洋商秘档》，第 205 页。